



回归“观看”本身

郑秉今



一次次走在观展的路上，我一次次在想：站在一件艺术品前，我们究竟在看什么？是调动知识去理解，还是放任感官去感受？观看这一行为，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原始也更为复杂。

慢慢地，我领悟到我真正意识到我在“观看”，并不发生于当我试图理解一件艺术品时，而是我直面作品，身体已先于意识作出反应的那一瞬间。

一次未曾预料的退后

那是一间光影被精确控制的展厅，空间宽阔安静，观众们眼睛逐渐适应昏暗，身体不自觉地被光源下的作品牵引，向前流动。

一整面展墙的中央，悬挂着一幅大型当代画作：没有炫技的手法，没有鲜亮的色彩，没有华丽的画框。画面由沉着灰暗的大色块构成，色块边缘处可见干燥起絮的笔触，整体作品克制而低沉。

我站在作品前，还来不及思考“它在说什么”，身体已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作品既没有强烈的视觉冲突，也不提供迅速抓人眼球的细节，而我的身体动作却先于思考迅速发生了。情绪未及，语言未至，身体已然清晰地完成了一次反馈。

那一刻我意识到：在我们尚未形成任何判断前，身体已经作出了回应——靠近、后退、停留，或是犹豫。这些动作构成了观看最初也最诚实的形式。

或许，观看艺术的第一步，并不需要急于理解。身体最初的反应，便是观看的悄然发生。

当“看懂”成为义务

第一次带父母走进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时，他们在面挂满白

色极简线条作品的展墙前停住了脚步。看了一会儿，父母转过头，眼里满是困惑：“我在看什么？”

这样的疑问并不少见，我们通常将观看理解成一种理性的活动。尤其是在博物馆这样的空间里，观众们似乎天然地、主动地承担起“看懂”作品的责任。于是，他们观看作品时不忙忙着“看”，还要掌握社会语境、揣摩作者意图、辨认风格流派，甚至确认作品在艺术史中的位置……在这样的期待下，观看不知不觉被定义为一条通向答案的路径：“我应该看到什么？我是否理解正确？”观看从经验变成了需要完成的任务。

事实上，观看并不一定要从问题开始，也未必以答案结束。很多时候，它只是身体与作品之间的相遇：被吸引而靠近，因不适而远离，或在不明所以中短暂停留。

面对艺术时，说出“我不知道我在看什么”并不意味着失败。这只是一次尚未被语言接管的观看，一次仍然属于个人的感受。

不仅是眼睛的事

在展厅里，人们很少留意自己的身体状态。面对作品，我们是靠近，还是保持距离？是匆匆掠过，还是被迫停留？这些细节往往被忽略。

当我们谈论观看，总是习惯强调“看”，却忽略了观看从来不是仅靠眼睛完成的行为。呼吸的节奏，



幻境之林 (油画) 拜福德



肩膀不自觉地舒展或收紧，脚步在某一处停留……这些细小而隐秘的下意识反应，往往比任何解释都诚实。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被鼓励去重视这些感受，而是被训练去聆听解释、被灌输概念与判断，让语言替代自身的反馈。

同时，在观看真正发生前，作品已被一整套成熟的系统包围了：展览文字、策展说明、艺术家名字、被反复讲述的社会及创作背景。这些信息为观众提供必要的指引，也在无形中设定了观看的框架。当解释先于感受出现时，观看

失序让人彷徨。

在这样的时刻，有人反复调整站立的位置，像是在寻找一个正确视角；有人短暂停留后迅速离开，仿佛不确定本身成了一种冒犯；有人与同伴低声交谈，试图从他人的反馈中验证自己的解读；还有人转身寻求一切可读的解释文字，希望在语言中重新获得确定性。当意识到这种不适，我们不禁发问：我们究竟是在看作品，还是在践行一套已被训练过的观看方式？

长期以来，艺术教育、博物馆制度、艺术史的权威、市场的选择，共同影响并塑造着我们判断艺术价值的方

式。我们被教育应当何时停留、何时略过，什么值得被认真对待，什么可以被一瞥带过。于是，毕加索的代表作前人头攒动，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品”鲜有人问津。这些机制像一层透明的玻璃，使我们误以为自己在直视作品，实际上却隔着一整套被建构的观看方式。

当熟悉的观看方式失效时，那份不安并非坏事。它提醒我们，真正的观看正在脱离既有轨道发生。

允许只是“在看”

这些习惯在成熟的体系中运作顺畅，以至于体制本身逐渐隐身。直到体系失效，身体的真实反应才重新显露。在语言尚未形成前，观看无法被量化，却并非空白。相反，这正是感受最为密集也最为私人的时刻：困惑、吸引、排斥、迟疑，都是观看正在发生的信号。只是在强调判断与结论的环境中，这些未经命名的经验被视为不充分。

每位观者搜肠刮肚，寻求语言的解释，试图给出一个清晰、合理、可被接受的说法，来阐述自己“到底看到了什么”。或许人们担心的并非看不懂艺术，而是无法给出一份被认可的答卷。好在，艺术本身并不渴求被说明，作品也不要被“看懂”。作品如同棱镜，在身体不自觉的反馈中折射出观者与作品之间真实而具体的联结。

如果说“看懂艺术品”意味着什么，那或许是承认观看本身的复杂性：允许感受先于定义，允许身体先于理论，允许一次观看没有结论，只有全然沉浸的在场体验。

当我离开那件肃穆的作品和那间昏暗的展厅时，我依然无法用语言解释“我看了什么”，也无法准确说出那件作品“关于什么”，却清楚地记得自己停留的位置，记得身体在那一刻的迟疑，记得目光在色块边缘停留了比理性预期更长的时间。这些细节无法被轻易概括，却真实地构成了我观看的经验。在所有意义成形之前，我已经置身其中。而那一刻，我确切地知道，自己正在观看。



想到就写专栏

“鲁迅之单人舞”。鲁迅竟然跳过单人舞？在何时何地跳过单人舞？闻所未闻，令人讶异。但这不是我的“发现”，而是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一篇文言小品的题目。

五四新文学勃兴，白话文逐渐取代中国传统的文言文。但五四那一代作家，不少都写得一手好文言文。鲁迅写过文言小说《怀旧》，还写过《〈痴华鬘〉题记》《〈游仙窟〉序言》《〈淑姿的信〉序》等妙文，王统照写过感人至深的祭母亲文，等等，不胜枚举。第二代如钱锺书等，也不遑多让。通俗文学领域里，周瘦鹃、郑逸梅等同样如此，张恨水也是其中杰出的一位。抗战时期，

张恨水先后出版的《水浒传人物论赞》和《山窗小品》两部文言小品集一纸风行，就是有力的证明。而今《张恨水文言小品合集》问世（桑农编，2025年12月黄山书社初版），更全面展示了张恨水的文言小品成就。

1944年8月10日至10月27日，张恨水在重庆《新民报晚刊》撰写文言“小世说”专栏，9月6日的“小世说”就是这篇风趣的《鲁迅之单人舞》。这个“小世说”显然是从刘义庆的名著《世说新语》转化而来，张恨水从“北大慈母”蔡元培写起，依次写了李石曾、章士钊、罗家伦、刘半农、蒋梦麟、林损、杨云史、吴梅、鲁实先等学界名流的

趣闻轶事，有的是他亲历的，有的是他耳闻的。以鲁迅在中国新文坛的显赫地位，当然不可无文，而且还是张恨水的“独家”披露。

《鲁迅之单人舞》共三段，第一段写鲁迅“曾屈为北京教育部小成说”。第二段写“鲁迅先生原配”，时至今日，这些都已不能说是“为人所鲜言者”。唯独第三段也即写得最长的一段，至今未曾有人道及，也最吸引人，故附录如下：
章士钊改女师为女大时，女师

大一部学生离校。由教授率领之继续上课于皮库胡同，□□(两字原刊漫漶——据《张恨水文言小品合集》所刊)苦撑，经费悉由师生自筹，鲁迅先生其一也。先生授课，指斥章氏，间杂以谑语，一座哄堂。一日，值校庆，师生毕集以示不弱。会后作余兴，先生任一节目。先生固不善任何游艺苦辞不获，乃宣言作单人舞。郎当登台，手抱其一腿而跃，音乐不张，漫无节奏，全场为之笑不可抑。先生于笑声中兴骤豪，跃益猛，笑声历半小时不绝。此为当年与会学生所不可不记，殆为先生仅有一次之狂欢，不可不记。
查鲁迅日记，1925年9月21

日，“晨赴女师大开学礼式”，这是北京女师大被章士钊主持的教育部强行解散后，部分学生另选校址自办女师大，得到了鲁迅的大力支持，正与张恨水此文第三段开头所说的相吻合。到了11月3日，鲁迅日记又记云，“上午往女师校十七周年纪念会”。那么，这个纪念会很可能就是张恨水第三段中所着力描述的“值校庆”，鲁迅不但与会，还“登台”作“单人舞”。庆幸“当年与会学生”作此事告诉了张恨水，张恨水认为这是“先生仅有一次之狂欢，不可不记”，于是就有了这篇“小世说”，他的描述完整、细致而生动，如身临其境。试想一下，鲁迅一人在台上即兴起舞，兴豪跃猛，台下学生笑声不断，这是一个多么有趣而难得的场景啊，真要感谢将之形诸笔墨的张恨水。

鲁迅之单人舞

陈子善

不张，漫无节奏，全场为之笑不可抑。先生于笑声中兴骤豪，跃益猛，笑声历半小时不绝。此为当年与会学生所不可不记，殆为先生仅有一次之狂欢，不可不记。
查鲁迅日记，1925年9月21

讣告

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济大学副局级退休干部，原上海铁道医学院副院长，原上海铁道大学副校长徐龙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2月9日21时01分在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逝世，享年85岁。

遵徐龙同志遗愿，丧事从简。

兹定于2026年2月13日10时30分在上海宝兴殡仪馆四楼福园厅举行告别仪式。

特此讣告。

同济大学

2026年2月10日

解放日报分类广告

刊登内容

- 遗失声明
- 注销公告
- 减资公告
- 吸收合并
- 产品宣传
- 拍卖公告
- 清算公告
- 分立公告
- 房屋征收
- 各类启事

承接地址：威海路755号上报大厦27楼

联系电话：021-63510135

传真：021-52920283

吴石官邸人来人往

1949年2月初，中央情报部负责人李克农电告上海吴克坚：“重点在闽、台。”为此，中共驻沪情报系统负责人吴克坚下决心向福建派人，联系和领导已在福建的情报人员。起初，考虑派林亨元去。因林亨元正负责策动林遵起义，脱不开身。经慎重考虑，决定调谢筱迺去福建组织情报系统。

该小组专门从事情报和策反工作，不与福建地方党组织发生横的关系。根据组织的安排，谢筱迺去还要单线联系吴石。

1949年5月3日，谢筱迺以“吴寿康”的化名离沪，先抵达香港，与由中央情报部派出的报务员姜平、译电员叶贤友会合。谢筱迺到香港后发现姜平、叶贤友尚无社会身份掩护，就在香港替他们搞了会计员、出纳员的证明书，并将密码放在头发油和棉絮内随身携带。

5月中旬，三人乘同一班次飞机飞往福州，但表面上装作不认识。下飞机出机场时，海关人员要姜平、叶贤友出示身份证，谢筱迺以不相识打圆场方式，告诉检查人员香港无发放身份证，姜平、叶贤友才顺利通过检查。出机场后，谢筱迺、姜平、叶贤友由在榕的潜伏人员接走，有惊无险地进入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福州。

5月17日吴石从广州乘飞机飞回福州。经联络，谢筱迺确定与吴石将军在福州的第一次单独见面。

在吴石回福州的不几天，谢筱迺便来到温泉路1号吴石官邸。这是一座独立的别墅，为双层住宅。接卫兵禀报后，吴石将谢筱迺迎进会客间，请谢坐下，亲



冷月无声 吴石传

郑立 著

手为客人沏上铁观音茶。谢筱迺将托带的短筒郑重地交到他手里，谈了需要帮忙的事情，吴石点点头，双方约定每星期三上午在公馆内见面。吴石对此风度不凡、气宇轩昂的年轻人颇为欣赏。

这次见面以后，每逢星期三上午，谢筱迺都到吴公馆去，将吴石准备好的文件、图表等密件取回。在短短三个多月里，谢筱迺与吴石频繁接触。吴石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谢筱迺向我们党提供来自国民党决策中枢的重要情报。为此，我方“获悉蒋介石在京、沪、杭解放后的‘全国作战部署’，特别是台湾及东南的部署及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动向情报；还获悉国民党军在福建省的战斗序列、在福建整编后的主官姓名、福州‘绥署’的兵力统计等情报……还随时获得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动向情报”。

一份份重要情报，经谢筱迺取回后，火速报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对吴石提供的情报极为重视。“这些重要情报，除通过电台报中情部告中央军委外，还及时提供给解放军福建前线指挥部参考，有力地配合了他们的作战。”

谢筱迺后来也提到其中最珍贵的一份是后来的蒋军部署。谢筱迺1999

年7月10日回忆，有一次，中情部首长接到中央领导的指示后专门来电，对国民党部队一个番号进行核对。当谢筱迺向吴石时，吴石敏感地回问：“周恩来先生看得到吗？”谢筱迺自然不好回答，笑一笑，点点头。

说话间，吴石眉宇间流露出满意的神情。谢筱迺每次造访后，吴石都亲自送谢筱迺到巷口。一次还诚恳地对谢筱迺说：“吴先生，万一出事，请及时设法通知我，我好想办法营救。”谢筱迺对吴石将军的热情、真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谢筱迺曾面对吴石之子吴韶成深情地回忆：“你父亲为人忠厚，亲切、坦诚，而且学识渊博。对我这当年只有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十分体贴，每星期我都到温泉路吴家一次，有时还在那儿吃饭……你父亲于福州解放前夕飞台湾。我们曾相约在台湾相会。后因我另有任务，未能履约。”

为了掌握福州高层动态，进行策反，吴石频繁邀请福州高官要人到温泉路府中吃饭，在攀谈中获取情况，进行策反。吴石官邸一时人来人往。

鉴于吴石与桂系的特殊关系，对于吴石在福州的动静，多疑的蒋介石放心

不下，也借谈话、视察的机会从旁了解，进行考察。1949年7月9日蒋介石赴福州督战时，特意召见了在福州的朱绍良、汤恩伯、李延年、王修身、陈士章、葛冠英、于兆龙、吉星文、李以勋等军政要员，一方面当面打气，另一方面当面考察，验证其目对这些人的密报。在单独谈话中，蒋介石特地单独召见李以勋详细询问了吴石的言论、表现。

1949年春夏之交，全国局势十分纷乱，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这时的福州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散兵满街流寇扰民，市民一片怨声，也感到恐慌。针对此局面，吴石专门签署《安民公告》，禁止士兵随意进入民宅。

一时由吴石署名的《安民公告》贴满大街小巷，福州民众由此知道了大名鼎鼎的老乡吴石。

7月9日上午，蒋由台北松山机场直飞福州，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在义序机场召集驻闽部分团以上军官临时军事会议。这是福州战役前国民党党政军的重要军事部署。

蒋介石一身戎装，从台湾坐“美龄号”专机飞抵福州。汤恩伯、朱绍良率一长列福建党政要员在机场“接驾”，并组织盛大的欢迎仪式。可蒋介石只在机场的办公大楼召开军事会议，做一番打气和训话，要求众将与共产党进行殊死战，死守福建，巩固台湾。

会上，蒋介石对福建防务、军队调整及后勤补给、工事修造等做了布置。蒋介石的福州之行，并没有给国军将士增添多少决战的勇气。在防御部署上，以福州为第一线，闽南为第二线，并在沿海建立起从马祖、平潭、金门、厦门到东山岛屿的防御线。

这番整编后，汤恩伯奉令守厦门，朱绍良则以5个军约6万人守福州。

(二十九)

连载